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 新中国的文化建设

吴小妮

1949年2月3日,在北京,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两千多名师生和工人市民一道,冒着凛冽的寒风,手举小旗,在前门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楚图南、吴晗、胡愈之、周建人、费孝通、雷洁琼、张东荪、钱伟长等一批知名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大批知识分子也以同样的心情迎接上海的解放。著名作家梅林说“当解放的信号,那密集的轰然震动于宇宙的枪炮声,一天一天地接近上海市郊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大的兴奋和狂喜中,我无论怎样也不能安静,整天在各处走来走去,或者在深夜站在狭小的晒台上,猜测大上海周围的枪炮声的远近,以及凝视那漫天的红光。”^①当时,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的争夺也显得异常激烈。蒋介石逃往台湾不仅要带走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银财宝,还要带走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亲自制定了一个“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并列出名单,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也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留在大陆或建国初期回到大陆的有60位,占院士总数的74%,去美国的12人,跟随蒋介石去台湾的只有9人,占院士总数的11%。对此夏衍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就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

声誉的专家,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建国初期,还形成过一个海外知识分子回国的高潮,大批的海外知识分子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夏衍由此十分感慨地说“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②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会有这种“很不寻常”的举动呢?

—

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很不寻常”首先表现在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上。知识分子无疑是人群中最具历史知识的一群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传统,特别是对近代中国所处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残酷现实有着深切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巨大历史功绩,中国知识分子真切地认识到“共产党是国家利益和新社会的代表者,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是服从国家、融入了新社会。由此引发了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期望和信心。他们决定以自己的知识财富来建设新政权,报效祖国”。^③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很不寻常”表现在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结,对于新中国寄予莫大

的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而且那代知识分子一向对自己的国家积贫积弱抱有切身之痛。1949年12月12日,老舍排除重重困难,从美国回到祖国,像所有进步、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老舍就去见了周恩来。面对一个全新的天地,他感到自己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

再次,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很不寻常”还表现在他们对新时代的正确认识。知识分子也是人群中最敏感的一群人。1949年激浪排空的年代转换,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敏锐地感觉到,时代需要知识分子。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只有200万人,占当时总人口的0.3%,其中高级知识分子仅有约10万人,这对一个6亿多人口且刚刚走出战争硝烟,百废待兴的共和国来说实在是捉襟见肘。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人民政权和建设新国家时对人才和文化的渴求显而易见。

在知识界,文化艺术界人士又是一群最活跃的人文知识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艺一直站立于革命文化运动的潮头浪尖上。建国初期,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曾热情地拥抱新中国,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满腔热忱地积极投身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1949年7月2日,由郭沫若等发起的得到广大文化工作者积极响应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将其作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建设新文化而奋斗。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章程,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这次会议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

星移斗转,历史巨变。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必然要引起思想观念和话语权的转换。为适应新时代的文化转型,更好地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文艺界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其他各界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更需要与新社会的磨合。老

舍和巴金的心路变化可能更能说明问题。

老舍认识到“由旧的社会走入新的社会,很难一下子就完全‘整旧如新’”。老舍决心“站在革命的战线上,打倒反革命——先扫除自己心中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垃圾,而后勇敢直前的打与人民为敌的思想与人物”,要拼命“歌颂今天社会的新人新事”。^④

1951年,老舍深入北京南城龙须沟,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政府造福百姓改造龙须沟的话剧《龙须沟》。《龙须沟》“描述了北京一条污水河沟两岸穷人的悲惨生活。1949年以前,臭水沟两岸的居民过着梦魇一般的生活——疾病蔓延,时常有人溺水身亡。居民生活不仅受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操纵,还要受贪婪的国民党政府盘剥,政府非但不治理河道,还向已经身处绝境的居民征收‘卫生捐’。与此相反,共产党清理了河道,为穷人找到了工作,还铲除了霸道的恶棍,实实在在地净化了两岸居民的生活环境”。“这一作品的主题巧妙地暗示了新旧中国的鲜明对照”,^⑤歌颂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龙须沟》成功上演,也使老舍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12月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950—1952年老舍共写了五部话剧《方珍珠》(1950年)、《龙须沟》(1950年)、《一家代表》(1951年)、《生日》(1952年)、《春华秋实》(1952年),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人同此心》(1952),此外还有各类曲艺、鼓词、相声、快板、太平歌词等。其实老舍自知不长于写话剧,为什么却要如此笔耕不辍?他的想法是“话剧是用活人表演活人,可以教观众直接受到教育,登时受到感动与影响”。“它直接地面对观众,收效必快”。因为老舍热爱这个新社会,渴望把自己的感受赶紧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也热爱这个新社会。“政治热情激动了创作热情,我非写不可,不管我会写不会”。^⑥“我急于写出作品,并期望收到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剧本这个形式适合我的要求”。^⑦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巴金先后两次到达朝鲜前线,写作关于朝鲜的散文、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近四十篇。如《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平壤,英雄的城市》、《在开城中立区》、《朝鲜战地的春夜》、《一个模范的连队》、《起雷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青年战士赵杰仁

同志》、《保卫和平,保卫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向朝鲜战地的战友们告别》等通讯和特写,后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回国后又写了《坚强的战士》、《一个侦察员的故事》、《黄文员同志》,结集为《英雄的故事》。^⑧这些作品一扫建国前那种“淡淡的哀愁”和“忧郁、痛苦的调子”,歌颂了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美好心灵和崇高精神,是新时代、新生活、新生活在巴金作品中的投影,也是他思想感情深刻变化的写真。

总之,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怀着一种“对政府的感激与钦佩”之情适应新社会,参与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新中国的文化发展出现了新气象。

二

当我翻检那一段历史时,我真切地感受到建国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他们的爱国热情,是那樣的真诚,又是那樣的强烈。但是我也注意到建国初期经历革命战争洗礼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绝大部分是建国前夕毕业和在校的广大青年学生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作家、记者等。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不熟悉工农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比较陌生和疑虑,所以由此也产生了“许多痛苦,许多摩擦”。^⑨正如周恩来所说:“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国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但是,有了民族思想、爱国思想,还不等于“就站稳了人民的立场”,而“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工人阶级的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⑩面对建国初期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建国初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和时代肯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因此在思想上也暴露出了不少困惑和疑虑。

1. 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不理解,甚至持怀疑与抵触的情绪。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0年,为了肃清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党在社会大众中,主要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提倡和鼓励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的内容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新经济

学、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但“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信服共产党是一回事,学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又是一回事”,一些知识分子颇不以为然,“很多人觉得自己的思想,本来是不反动,不错误,不落后的,还要改造它干什么?还有人以为研究学术是应该自由的,必有研究的自由,才能从多方面求得真理,不应该以一家之言,限制住了每一个人的思想领域,所以认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解认识则可,用它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大可不必”。在政治学习的起始阶段,“几乎有一半人存在着怀疑和对抗思想”,^⑪甚至还有极少数教师“看不起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为这只是公式教条,不算学问,因而拒绝学习,而且以为抗拒学习,正是表现一个有学问的人的骨气”。^⑫

2. 建国初期的高级知识分子过分推崇西方。

建国初期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留学背景,其中又以留学美国为多。长期以来美国以教会为工具,在中国举办文化教育事业。根据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就有31所,神学院32所,图书馆20所,文化团体26个,中学校324所,小学校2364所。”^⑬其中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和赞助的学校数量居多,“在中国20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即占17所之多;300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200所,几占2/3;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1/4”。美国在教育科学文化诸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文化渗透,崇拜美国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流行心理。在有教会或美国津贴背景的学校中,对美国抱以好感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当时中共的政治宣传往往会受到学生们的公开抵制。比如,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在圣约翰大学作《国际形势与美国政策》时事政治报告中批评美国时,却被学生当场鼓倒掌,弄得几乎下不来台”。^⑭

3. 建国初期的人文知识分子文化观点滞后,不能真正理解文艺与政治与工农兵的关系。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

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全面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⑮但会议并未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文代会后不久,文艺界先后围绕着电影剧作家冼群提出的“不可写小资产阶级”、阿垅挑起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这些讨论表面上看是文艺工作者在如何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实则反映一些作家试图保持以往文学审美旨趣的追求与新文艺规范之间的内在紧张。

对此,中国共产党认为,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⑯要破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首先需要文化创造和传播主体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改造。正如毛泽东所说,知识分子要“担负起教育别人的角色”,“首先要作好学生”,要“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⑰1951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和天津地区高校教师代表开大会上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在旧社会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要性。1951年10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⑱陈晋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诠释时尚追求的信念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因此,人们一般把它叫着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的信念体系自然无法承载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难以满足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⑲

三

1951年秋至1952年秋历时一年的针对知识分子(主要涵盖面为原国统区内的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演。在近代中国,教授和作家是创造和传播文化的主体,讲台、文艺作品和学术交流等都是他们发挥作用的主渠道,“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

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⑳因此,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随后推进到文艺界、学术界和整个知识界。毛泽东还专门为文艺界的改造做出批示,要求各级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高度重视,通过整顿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个人的思想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㉑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孔孟提倡的“自省”传统,因此,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思想改造的基本方式。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了解新式话语阶段,从著名学者、作家到普通教师,都要认真地阅读、领会有关政策文件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第二阶段是清理原有话语的阶段,知识分子根据所学文件和著作检讨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名利思想等,特别是亲美、崇美思想;最后一个阶段是意识形态上的自我批评批判阶段,即用新的话语体系表达新思想。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㉒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㉓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成功后,文化上首先必须清除的便是封建的、买办的文化,建设“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㉔建国初期,整个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时期,“新”“旧”两种文化面貌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呈现思想多元化,价值观念混乱,党需要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系统的批判和清理,对旧的思想观念进行革命的改造,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革命,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建无产阶级的话语权。

正是由于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参加一系列社

会运动,知识分子了解了旧中国人民生活的苦难,增强了对革命的认同,进一步感受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和重要。独具个性、敢于向毛泽东要“雅量”的梁漱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长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表达了自己的真实心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往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脚,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中共之所以对。”²⁵梁漱溟行事,“必本于自己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他一直不认为武力能解决中国问题,但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不得不信,便自觉抛弃他原来的主张,转而奉马克思主义为真理。他在给林伯渠的信中说“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²⁶曹禺也有同样的感受,1952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永远向前——一个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表达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代文艺队伍一员的自豪感。他说“我是一个从黑暗的旧社会里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一直向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识却受了相当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多么感激和骄傲”,今天“成为毛泽东文艺队伍中的一员”。²⁷

2. 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从当时的报道和文献看,广大知识分子是积极主动地,甚至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响应执政党的。许杰表示“在人民当中,在群众的进步当中,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为什么不能改造呢?”²⁸很多人在学习总结里都用新学来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标准,衡量和检讨过去。

教育界、科学界和学术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检讨“为教育而教育”、“为科学而科学”、“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等被认为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树立阶级斗争的观念,认识文化教育的阶级性或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联系,表示日后要服从国家需要,把教育、科研、文艺创作等同现实同工农业生产密切联系起来,反映和解决国家建设中提出的问题。二是检讨和批判“崇美思想”、“洋奴思想”和“买办思想”,摒弃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崇拜,同时努力学习和吸收苏联的学术与思想成果,改造和重塑中国的科学

文化事业。文艺界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检讨自1930年代以来存在的文艺脱离实际、脱离政治,“没能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错误倾向,表示今后文艺创作要有鲜明的政治主题,充满激情地歌唱、颂扬和描绘往日胜利的革命斗争和新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努力实现文化大众化,从叙述内容、结构、表现方式到语言,努力做到为工农兵喜闻乐见。1952年5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老舍的《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表达了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受。他说“读完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艺术生命。”

由此可见,思想改造运动后一元化文化形态在方方面面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建设、学术、艺术研究与创作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开始确立,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

3. 促进了知识分子献身于新中国文化事业。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解决的是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那么在这一问题解决之后,知识分子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新中国文化建设事业。

建国初期为了适应大规模国家建设的需要,必须完成培养大批高级建设人才的任务,而这则要求对大学的既有教育制度、内容、方法进行彻底改革,即转向苏联模式。但主要由于教育理念的差异,以及对“一边倒”政策的不满,一些知识分子对高校教育模式的转换存有抵触情绪,高校改革因而也进展缓慢。经过改造,到1953年,整个院校调整工作基本结束,之后培养一大批适应国家建设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

文艺工作者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同时,满腔热情地深入工农兵、了解工农兵、表现工农兵,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使文学创作在主题、题材、人物、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新面貌,反映革命历程和工农兵生活的文艺作品迅猛发展,并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新中国文艺的接受和介入也使得当代的文化和思想启蒙具有更广

泛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克服了“五四”新文学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的弱点,这些成就和影响成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开端,并逐渐形成新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

这一时期文艺创作成就显著,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小说如《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创业史》、《铁道游击队》;电影如《白毛女》、《钢铁战士》、《赵一曼》、《翠岗红旗》、《南征北战》、《智取华山》、《鸡毛信》、《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青春之歌》等;戏剧如《龙须沟》、《雷雨》、《王贵与李香香》、《送双粮》等,不仅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而且通过演绎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人物的事迹,讴歌了伟大的社会变革,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寓于艺术熏陶之中,充分发挥了文化的教化民众的功能。□

- ①《上海解放有感》,《文汇报》1949年6月29日。
 ②转引袁鹰《〈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炎黄春秋》2006年第3期。
 ③崔晓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及原因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1期。
 ④⑥《老舍全集》第14卷第474、5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⑤[美]史景迁著、尹庆军等译《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第33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 ⑦转引自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下)》第7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⑧南昌宝《“检讨”与文学转型——巴金1950年代的另类文字》,《粤海风》2009年第6期。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⑩⑪《周恩来统战文选》第211—215、29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⑫于风政《改造》第3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⑬翦伯赞《教师学习的问题很多,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光明日报》1950年8月11日。
 ⑭《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⑮转引杨奎松《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
 ⑯《周扬文集》第51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⑰《周恩来年谱(上)》第1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⑱⑲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5—407、49、406—40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㉑陈晋《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中)》,《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
 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㉓㉔《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70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㉕梁漱溟《梁漱溟自述》第13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㉖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8卷第7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㉗㉘于风政《改造》第25、255—25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书·讯

孔汉思著,邓建华、廖恒译,杨煦生校《世界伦理手册:愿景与践履》 三联书店2012年11月出版

《世界伦理手册》是孔汉思(Hans Kung,或译汉斯·昆)教授关于世界伦理构想的最新著作,是孔汉思在其思想和著述生涯中自己珍视的著作之一。本书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与德文版几乎同时面世。世界伦理的观念并非追求某种普遍伦理,它尊重由宗教或哲学方式奠基的道德文化的多样性,根基是不同民族的古老智慧和基本的生活原则,并且从诸种文化的不同宗教与伦理传统以及习惯法之中积淀而成。孔汉思从现实生活、哲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生理—心理学和宗教学的不同路径和领域展开论证:世界伦理的精神建构工作,早也与我们生活世界息息相关。